

我們時代的法西斯主義 A Fascism for Our Time

哈若圖寧 著

Harry HAROOTUNIAN

陳春燕 譯

Chun-yen CHEN

一

最近這波瘟疫（新冠病毒，COVID-19）的出現，以及法西斯主義言論與作為在當代美國政治、社會場域的時而閃現，或許意謂著二者各自發展的路徑在此刻以驚人的巧合相遇，亦可能表示它們之間有著我們未曾聯想過、無從預料的緊密關係。細究之下，瘟疫與法西斯主義是極為相似的，儘管它們之間毫無有機性、歷史性的關聯。因著偶然的行進軌道轉向，兩者彷彿命定一般交逢，共同促成了我們如今必須忍受的苦難與煎熬。這並不令人意外，畢竟兩者皆遵循著這個地球資本主義的進路，¹兩者皆連動著資本的動向與擴張，其態勢唯有地球本身能夠遏止。

投稿日期：2021年1月20日。接受刊登日期：2021年2月18日。

* 文章原發表於美國文學雜誌*Massachusetts Review*之網路副版*MR Online*（刊登日期2021年1月6日），經作者與*MR Online*授權翻譯、編修。為精簡篇幅，譯本略有刪節；文章引述資料有誤之處，譯文已逕行補正。

** 哈若圖寧，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榮譽退休教授。

*** 陳春燕，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聯絡方式：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臺大外文系。chenc@ntu.edu.tw。

1 有關全球資本主義與新冠病毒世界性路徑之間的關係，參考以下文章精闢的分析：Andrew Liu. 2020/03/20. “‘Chinese Virus,’ World Market,” *n+1*, Retrieved from: <https://nplusonemag.com/online-only/online-only/chinese-virus-world-market> on Nov. 10, 2020。

源生於上個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法西斯主義，是最能代表工業資本主義的政治形式。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法西斯主義猶如資本機器的鬼魂一般根植於其中，每當資本主義遭遇危機，亟需找尋出路，以從它自身的矛盾中解套，法西斯便是那個隨時可被落實的定理。這一次，危機來自資本體系之外，挾帶瘟疫而來，然而，正如我們已被迫觀察到的，人們無能做出適切的因應、調整，使得原本的緊急狀況益發嚴峻：病毒迅速離開源頭，旅行至世界各地，加深了發展不均的現象，所到之處，不平等情況變本加厲。由於沒有任何地區能逃過資本主義的破壞力道，世界上所有可居之處無一能躲開此次瘟疫的致命效應。瘟疫與法西斯主義，方式各異，卻都足以致人於死——儘管效力可能比俄羅斯毒藥櫃的毒藥稍微遲緩些。它們削弱了社會性得以被穩定行使的可能性；在某些地方，例如美國，這場瘟疫則被用來召喚法西斯主義，以期強化對於全面性危機的恐懼，堅持開放之必要，堅持讓人們恢復工作，以避免經濟崩盤。這個政術讓那些掌權者敢於擔保病毒將可及時受到抑制，不過這個承諾的結果並非控制局面，而是加速了病毒的蔓延，讓老百姓的死亡率攀升。

新冠病毒與法西斯主義同樣也都仰賴假消息的流通，尤其又有熱切的社群媒體助長訊息的傳輸。然而，預期這一切可能終結的念頭本身便是一種不切實際，甚至是個陰謀，畢竟，若要法西斯主義消失，唯有資本主義同時瓦解；瘟疫效力或許可望減弱（只要能順利開發且有效分配疫苗），然病毒恐怕永遠不會消失。病毒與資本主義兩道發展路徑的交匯，顯示出它們分別都是禍害；一旦兩者結合，則是一場全球性的歷史災難，能產生可延續極長時間、充滿殺傷力的全球文化。換言之，它們的相會，實應被視為全球性的事務，而非以鞏固區域性、全國性壁壘的方式處理之。

誠然，討論這個時間點的契合，似是小題大作，不過，這始料未及的匯聚——一場致命瘟疫與一種殘暴的政治傾向——詭異地促成了一個新型態全球結構，不計一切地重整世界秩序，嚴重威脅人們對民主最後殘存的一絲想望，並造成難以計數的傷亡，對存活者則帶來無法估量的後遺症。此一巧合，正在摧毀許多人記憶中的「正常」（normalcy）。然而，此刻被

浪漫化爲「正常」者，只是對於不久前的過去的誇大其辭，原因很簡單：新冠病毒與法西斯主義此刻的鬼魅現形，揭露出號稱奠基於法治的政治形構，然背後的真相卻是，作爲此一法治基底的種種規範（norms）早已支離破碎。從近日各式戲劇性事例可見，原以法律治理公民的憲政體制已被顛倒、逆轉，使得任何人如今都能輕而易舉破壞任何規範，遂行己身對權力的追逐。此外，搖搖欲墜的經濟、效能薄弱的國家健保制度（保護的不是公民的福利與安全，而是嗜血的保險公司與藥廠，以及控制兩大政黨的政治階級），更讓這已然殘破的法治體制景況愈顯顛危。

令人覺得羞辱的是，「代表」我們的，是一群不值得尊敬，幾乎相當於世襲政治階級的人，他們掌權多時，表現得如同寡頭政體的領導人，即便對百姓表達關注，也僅是短暫的，只發生在儀式性的選舉期間。目前這位總統（按：川普〔Donald Trump〕）不過是畸形的美國政治想像最新一個但無疑也是最具代表性的範例。這個政治想像的變形，事實上可溯源至美國「共和國」的創始之初，乃至那些不斷被稱爲「『神聖』建國之父」者——彷彿他們是奧林匹亞衆神，短暫降臨俗世，創立這獨特的「造在山上的城」（City on the Hill），美利堅合衆國，隨即返回其雲端居所，然後在國家開始擴張之際觀察它無可避免的窘境。麥迪遜（James Madison）便曾提出一個奇特的建議，即這個「封建制度」必須在「放大的規模」下才最成功，因其效應將可助長他與同伴理想中的共和國願景。然而，美國歷史業已證明，麥迪遜心所嚮往的由國家擴張而達致的共同性（commonness），實則消滅了「共同動機」與「和諧」的成效。²美國此時被迫記起並體認的真正問題在於，它所以爲的「可接受的正常」早在新冠病毒與政治法西斯警訊出現前便已開始不正常；而也正是這「可接受的正常」方使得川普有機會取得權力。

2 關於這些論點，我大量參考了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2011）的專書。

事實是，法西斯幽靈的復出，在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執意進攻伊拉克的決定中便可窺見一二。至今，我們和伊拉克仍處於交戰狀態（尤有甚者的還有阿富汗），無異形塑了美國版的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追根究柢，這些戰事的源由，除了表面上是要捍衛美國國土安全，不過是無聊又沒有意義的帝國冒險（國土從未遭遇這些遙遠地區情況的威脅）。真正威脅國家安全的，很明顯是我們這個積習難改的政治制度。沒事便發動戰爭的習慣，只成就了兩件事。其一，這些戰事強化了行政權在國內的擴張，亦促長了法西斯主義，代價是年輕美國士兵以及不可計數的伊拉克、阿富汗百姓的生命。其二，此一好戰的習慣，坐實了哲學家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一句箴言：「任何人若無意討論資本主義，最好也對法西斯主義保持緘默。」（Poulantzas 1979: 17）我想做的，便是打破沉默；但我們也必須參考普蘭查斯（Nicos Poulantzas）對霍克海默的修正：「無意討論**帝國主義**的人……最好對法西斯主義保持緘默。」（ibid.）

此刻，川普政權正逐步在訴求一種體制化的國族主義，其動機並非是在社會面向厚實國家共群架構，反而是侵蝕其剩餘部分，藉由曖昧的技術，實現某種法西斯共群，並將此一建立於白種美國人種族優越心態的共群宣揚為真正的民主。這過程就像是川普總統試圖組織一場社會運動，策動一局緩慢進行的政變，讓他從這個業已由他掌理的**國家機制（the state）內部奪取權力**，乃至授予他終身的領導權：這是十八世紀制憲過程努力要避除的一種對於君主威權體制（monarchial authoritarianism）的慾望，企圖以總統級行政首長取代憲法，其權力不僅已超越君權，且隨著就任後國家規模的延展與海外勢力的擴張而急速膨脹。促成總統行政權放大者還包括了小布希、歐巴馬（Barack Obama），以及幾位近期的總統。到了川普任內，行政部門權力放寬到一個地步，他甚至開始自稱為「領袖」（leader），遙遙呼應了曾在德國歷史出現過的「領導」（Führer）。搭配此一新稱號的，是場堪稱為法西斯主義的運動，動員對象為一致懷抱某種

無名憤恨（ressentiment）的中低階層工人，而川普則不斷地利用這種怨懟情緒，讓他們相信他和他們是氣息相通的。這恐怕是川普最可觀的成就，讓人聯想到當年雷根（Ronald Reagan）一開始時也是成功地說服一般美國人，他和他們是同一類的人。但雷根顯然演技更為精湛，因川普倒是並未用力地包裝他要他的追隨者買單的那套虛偽意識型態；事實上，他反而是鼓動他們相信，他們也可以變成跟他一樣。

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曾在評述二戰前德國情況及當時反猶太氛圍時，解釋了領導人與追隨者之間的情感連結，其說法對川普現象有某種參照的價值。在他1951年的文章〈佛洛伊德理論與法西斯政宣之模式〉（“Freudian Theory and the Pattern of Fascist Propaganda”），阿多諾試圖說明佛洛伊德如何看待諸多個體轉變為群眾（mass）的過程：是何種因素讓個體們團結在一起，尤其假使他們「以理性出發之自我利益」無法相容於「法西斯群眾煽動者」（fascist demagogue）；此煽動者如何讓一大群人支持他們原本不認同的理念（Adorno 2000: 12）。³答案是，那是一種具有本能欲力（libidinal）屬性的刻意連結，構成基礎是愉悅原則（pleasure principle），亦即「個體屈服於群眾，由此獲致之感同身受的快感。」（ibid.: 122）佛洛伊德的觀察是，身體服從於群眾的追隨者並非尚未開化的原始人，但他們卻會表現出與他們正常理性行為相衝突的原始行為與激烈情緒。這個由理性個體到原始性的轉變，揭露了群眾行為中某些特質與古老行徑（the archaic）的相似：若要達到預期效果，「領導人本身必須表現極端的自戀」，才有辦法在可能演變為法西斯共群的群體中「引發自戀式認同」。個體面對意欲持盈保泰（self-preserving）的強勢自我代理人（ego agent），同時應付總是無法滿足其欲望所帶來的頓挫，解決之道，唯有「強烈的自戀衝動」，且這些衝動若要被「吸收、滿足」，只能透過將領導者「理想化」，把自戀欲力「局部轉移」至領導者身上：將領導者轉化為理想型，助長對自我的珍愛，消解了自我所背負的「挫折、失望陰影」，因為此刻追隨者看見自己「可反映於領導者本人的自

3 我要感謝托斯卡諾（Alberto Toscano）在其部落格文章中提醒我們阿多諾寫過的這篇重要文章，我也受惠於他對阿多諾的精彩見解。

我中心」，從而衍生出同種族的親密連結或同志情誼（*ibid.*: 126; Toscano 2017/04/02）。

阿多諾說，這樣的理想化是種集體行爲。但我們也必須小心，避免將此一團體理解爲某種階級，⁴儘管部分成員可能自認爲是有能力發動武裝叛變的積極分子。阿多諾在此所描述的，實爲一種「心理匱乏」的例子：主體「讓自己受制於客體」，「且以客體取代主體最爲關鍵的組成要素」（例如超我，*superego*）；這「預示了〔…〕『後心理』階段、去個體化的或已被物化的社會單位（*postpsychological de-individualized social atoms*），而正是這些『社會原子』成就了法西斯集合體。〔…〕『虛假』（*phoniness*）此一特質可用以描述領導人，亦適用於群眾之認同動作及他們的瘋狂與歇斯底里。」（Adorno 2000: 136）追隨者並非真的認同領導人本身，而是意圖實踐「他們自己的狂熱，因此才參與他們領導者的表演。」（*ibid.*: 136-137）不過，儘管阿多諾運用佛洛伊德學說解釋法西斯主義與種族主義的說法十分有用，他自己也坦承，他的分析欠缺了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條件的評述，未能解釋那些傳介憤恨情緒、無妄欲求以及法西斯群眾形式之條件。無論如何，在此「後心理」形構中，我們可以看到，法西斯主義如何是主體自主性（*subjective autonomy*）的一種負式扭曲。

另外必須一提的是，一位領袖人物的跟隨者都是全心投入、「不折不扣的信徒」，忠誠的支持者，對於他們被灌輸的理念、論述一知半解，甚至文字對他們其實並無太大意義。這些追隨者只在乎他們的領袖，他說什麼都無妨，即使毫無道理。追隨者心理形構的關鍵，恐怕不是他們對理念的漠視，而是他們的領導者是否投射出決然自戀、自信的形象，是否展現強勢，認證他自己所說的話——換言之，重點在於他呈現的形式，而非其內容。

這有助我們理解，何以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分子曾說，自己並無特定的

4 〔譯者按〕此處原文爲「避免將此一團體理解爲某種階級或某種運動（*movement*）」，不過因爲文章多次提到法西斯運動或川普在組織的運動，似有矛盾，故從內文略去。

意識型態——雖然那樣的宣稱本身便已透露他們的意識型態為何。但川普及其追隨者另有個面向，是經常被忽略的。川普在四年任內——當他沒在打高爾夫球、沒在推特上推文時——有計畫地在全國各地安排數不清的集會，參加者主要是那些或可稱為他的運動的在地「草根」分子。儘管這些集會被多數觀察家視為川普在為連任及早暖身，它們其實也是大型的娛樂活動。我曾想過，川普是以電視實境節目藝人的身分巡迴各地，娛樂廣大的群眾；他們把川普為他們帶來的熱鬧場面頗當作一回事，儘管他的動機純粹是操弄與算計。

三

許多人一直未能釐清的是，法西斯主義與資本主義，都仰賴著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瓜達希（Félix Guattari）所稱的「微型法西斯」（microfascisms）而活力旺盛：「牽動法西斯主義的，是許許多多分子式聚焦點（molecular focuses）彼此之間的互動，其重心會從一個點跳接至下一個點。〔…〕農村法西斯與城市或鄰里式法西斯，青年法西斯與退伍士兵的法西斯，〔…〕伴侶間的法西斯、家庭的或學校的或辦公室的法西斯：每一種法西斯主義都是一個微型黑洞，自行獨立，也彼此溝通，最終匯聚為一個巨大、具普遍性並占有中心地位的黑洞。」（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 214）法西斯主義的力量，在於它驚人的增生微型組織的本領；這些微型組織「具有無人能及的穿透社會各個角落的能力。」（Daniel Guerin 語，引述自ibid.: 214）由此觀之，法西斯主義最危險之處是它「分子式或微政治式（micropolitical）的力量」，源自草根，繼而集聚為群眾運動，是個「有癌細胞的身體（cancerous body），而非極權式的有機體（totalitarian organism）。」（ibid.: 215）在規模盛大的人群集結中，總是容易辨認其法西斯目的，例如希特勒（Adolf Hitler）的紐倫堡集會，或是沒那麼壯觀、只想娛樂追隨者的大型表演。同時，我們也能發現周蕾（Rey Chow）曾申論的「我們當中的法西斯」（Chow 1998），又或如儂曦（Jean-Luc

Nancy) 所言之「吾人的歷史」，意即人類真實經歷的法西斯主義歷史，由「個人式與集體式的分子」所共同維持、滋養、愛惜 (Nancy 1990)。看得到的事物遮掩了更重要的看不見的事物。將國家共群建立於無名憤恨 (化身於原子化、切割化的個人)，只會導致社會的消失。

當代美國憤恨情緒所透露的巨大焦慮，來自中下階級白人對於失去自身多數族群優越地位的恐懼。必須一提的是，在美國，種族向來是將注意力從階級問題轉移開的捷徑，用以避免階級衝突的威脅。移民族裔社群雖然通常被擠在貧民窟之類的共同空間，他們原本是各自分隔的；國家機制後來在形式上進行努力，鼓勵融合，卻未將其中的障礙排除。大家寧可看見種族間的衝突，而不願見到勞工與資本—政府結合體之間的衝突。這個理論背後的預設是，個人的種族背景無法選擇，生來如此，但階級則是開放給所有人自行認同，無關族裔，因此提供了可大範圍動員的團體之力，以共同利益為基礎，超越種族藩籬、性別差異，而這可能引爆長期、深遠的社會衝突。其實不難看出，美國資本主義從一開始便頗能容忍蓄奴制度，將黑人工人的勞力私有化，要他們終身為農園勞役。資本主義從過去到現在的首要信念向來都是利用各種方式掌控勞力——只差沒有具體施行奴隸制度——以防堵勞工製造足以干擾工業生產的紛爭。美國中西部與東北部的工業勞力以及西部（尤其加州）的農業勞力的發展歷程，如同馬克思 (Karl Marx) 曾對各地勞動力所做的描述一般，是部「血淚紀錄」 (“written in blood”)，而過程當中美國主義 (Americanism) 常被用來鼓動對於工人更嚴重的剝削——這段歷史，一直是美國崛起成為世界霸主的成功故事背後反面他者。

我們必須體認，法西斯主義是有歷史的——這意謂著它可能再次浮現，就彷彿遵循某種歷史重複性法則一般。只不過它的再次出現 (reappearance) 並非嚴格定義下的重返 (return)，因為它從未離開，無論歷史學家們如何自信滿滿地堅信，法西斯主義已被安全地存置於無法回歸的過去。相反地，此次的新冠病毒在歷史上從未現蹤，但如今，正如法西斯主義，它也將開始演化出自己的歷史，且不再離開。另一方面，呼應

瘟疫的突變能力，重現的法西斯主義不會是過去版本的精準複製，而是呈現顯著的差異，反映出這個特定的時代。基於它與資本主義的定律關係，法西斯主義的形式——即對於主體自主性的破壞——仍未改變，然隨著每次的重現，配合不同的歷史當前時刻（present），它會帶來新的內容。李維（Primo Levi）在1970年代便觀察到，每個世代都得預期法西斯主義以新穎、變異的樣貌回歸，他稱之為「安靜的離散納粹」（silent Nazi diaspora）之餘緒（Levi 1989: 188）。我們這個時代的法西斯主義，或許不會參照其前身之暴力、脅迫手段，但仍然可用各式方法達到相同目的。一個顯著的例子便是對於虛構化、浪漫化的過往抱持無可救藥的懷舊情緒，而懷念的是那些讓人們對失序狀態產生無端恐懼的計策，以及那些護衛秩序的規訓技術（Levi 2004: 70）。在美國的法治體系中，自18世紀聯邦憲法制定以來，其核心便是讓個人財產受到保護、捍衛的原則凌駕於公民全面福利之上。這個傾向一直延續到當代。只要有衝突的跡象出現，即便只是一絲絲的抗議舉動，都自動引發人們對於恐怖無序狀況的不實想像，害怕亂象對於私有財產帶來的挑戰。

阿多諾（Adorno 1998: 98）指出（可呼應李維的說法），法西斯主義的不引人注目是毋庸置疑的，因為它一直都在；他並認為，曾促成法西斯主義的「客觀條件」也依舊存在。他的這個立場，有別於他曾在《威權性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所呈現的觀點：在這本與人合著的書中，阿多諾特別框定了影響歷史時局的客觀條件，以評估法西斯主義形塑過程中的主觀心理決定因子（Adorno et al. 1950）。而在另一著作中，他則指出，公民社會（及其中產階級守護者）總是無法靠著自身條件而持久，以致終究會墮入發展歷程的最終章，亦即必須仰賴國家機制式或具威權體質的組織，排拒經濟力量的直接「參與」（play），抑制其「動能」，轉而訴求可使「社會重回〔…〕單純的複製（reproduction）模式」的脅迫方式。換言之，公民社會力圖保全自身活力的努力，換得的是「向法西斯主義與極權政府靠攏的趨向」（Adorno 2017: 80）。而這顯然是美國最近抵達的位置。

有趣的是，新冠病毒與法西斯主義不僅出現在同一時代，似乎也有辯證關係：一方面，孕育出法西斯主義的客觀條件至今仍在；另一方面，疫情爆發之際，出現了各種不當的因應方式，而造成這些反應的客觀條件在疫情之初幾乎立即被暴露出來。值得注意的是，阿多諾當時所關注的是法西斯主義的結構性成因，而他做出的推論是，法西斯不可能單純肇因於「主觀性格」，因為成就法西斯的客觀條件存在於各個當前時刻。他相信，即便人們會因薄弱的記憶和「無情的遺忘」而忽略法西斯主義，但它一直在每個時代伴隨著資本主義，定期復出，但多數時候隱藏在陰暗處，待經濟系統再度墜入衰退與危急時便會重現：經濟秩序的運作機器與組織使得「大多數人必須依賴他們所無法掌握的〔客觀〕條件，也讓這些人持續處於政治上不成熟的狀態（political immaturity）」（Adorno 1998: 98）。

身於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如欲生存，是別無選擇的，只能服膺於一個他們所知甚微乃至一無所知的經濟組織模式，這是形塑他們的社會及此一社會內部關係的基礎結構，迫使他們否定民主理想冀望實踐的主體形式，即主體的自主性；在多數的工業資本主義社會，這樣的主體性已被消費主義式、原子化及自我中心化的個人主義所取代。願意屈從於自己既不理解亦無從控制的客觀條件，意味著容易聽命於威權體系，接受權威者所呈現的事物樣貌：「那些永遠弱勢的人〔…〕會寧願擺脫自主性這個義務，〔…〕把自己拋入集體自我的大熔爐中。」（*ibid.*: 99）阿多諾說得沒錯，「人要保全生命的方式便是放棄自身」；這也呼應他藉由佛洛伊德解釋個人為何屈從於領導人的說法。民衆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加上那些深化他們依賴性的限制，致使他們誤判他們憤怒與不滿的源頭；他們於是責怪他人，而不是責怪環境的結構或他們自己。他們活出的只是淺薄的政治主體性，將自身的無力感「予以主體化」，結果是主體與客體的距離被放大，最終使其誤將後者視為前者，也就是他們自己（*ibid.*: 93）。

四

關於民主，無論有多少論法，其首要理念無非是在每個主體身上擴展個人自主性，同時認可其他人的自主性，以此成就一個奠基於共同利益的真正人本或公民的共群。佩戴口罩用口罩與否，不是得以用來主張自身立場、以個人權利為名違反規定的事例，因為不戴口罩會影響他人，是漠視他人的權利。但一般人一直未能參透箇中迷障：他們被灌輸的「民主」，其實從來未能被力行、自然化到一個程度，讓他們有辦法在其中看見自己，在其中經歷自己作為政治過程的主體，作為他們自己的身體，而非選舉選出的領袖的身體（*ibid.*: 93）。我的申論是，美國這個國家從其「建國之父」的時代開始，「自主主體」的實踐範圍向來只限於那些寡頭統治的領導階層；人民（*demos*）被遺忘於黑暗荒野中，只能安分當個好公民，亦即當個心甘情願的追隨者。

形塑美國社會組織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模式，若真有歷史可言，其唯一的歷史是對於相同過程之循環重複。孕生其中的法西斯主義形式，挾帶其號稱始終不變的鬼魅面貌，會毫無預期地出現，猶如死後還魂，提醒我們該做什麼，需要犧牲什麼，才能讓機制重新運作如常。大多數生活在美國（以及其他工業社會）的人活在一個沒有時間的時區（*timeless zone*），活在一個永恆的當前時刻，永無止盡向外延展的當下。他們的每日生活是由工作日的時間所決定，無限地周而復始，直到經濟機制崩潰——例如此次疫情期間——方才暴露了一直未被關注、察覺的雙重危機如何複雜地牽動了此刻的局勢：一個失敗的健保系統，以及全球性的氣候、環境災難。於是，法西斯主義選擇與資本主義所製造的經濟危機切割，以求修正、保全資本主義不被自己衍生的危機所害；法西斯也藉由此一救援事件擬造出自己的歷史性。阿多諾曾稱呼這樣的解救任務為「沒有記憶的人類的一場噩夢」（“*the nightmare of a humanity without memory*”）。

從一開始，美國共和國的崛起便是由早期商人資本制度與商務貿易所主導；美國從創始至今都保持著一種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動力。這一點，

韋伯（Max Weber）早已觀察透澈，才會將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視為此一精神的絕佳範例。美國的源起，是中產階級精神，體現於一種「企業自由主義」（corporate liberalism）以及由此衍生的「自有所有權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像美國這樣的社會乃建立於交換原則：不同利益方彼此間的協商，金錢與商品間的交換，而交易之後不遺留任何紀錄。換言之，交換行為本身是不具時間性、沒有歷史的；一旦交易發生，它便被移除至時間之外。

幾位思想家已為我們指出，工廠之為體制與生產的系統性組織，會仔細計算社會所需時間（socially necessary time），決定這個社會需要多少勞力才能製造一件商品，並據此訓練工人。然在實際生產過程中，時間並未被具體標記（“the marking of time, as such, is absent”）。引進時間研究，以估算、決定生產一件產品的最有效所需時間，這個做法使得時間被抹除，因為從那一刻起，時間的運行已被例行化，在資本主義生產循環模式中被自動地重複。工廠體制有別於傳統社會之處便在於這個被消弭的時間，因為時間的存在對資本主義者而言乃非理性的殘餘之物。富蘭克林或許相信「時間就是金錢」，但他的觀點其實已被商人資本制度的視野所制約。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便已提出，工業生產將「封建」藝匠式勞力相關範疇（例如訓練工匠熟悉一個專職或技藝所需的時間）化約成反覆的循環，不需要或只需少量的累積經驗，有別於經驗在傳統工作中舉足輕重的意義。具體時間（concrete time）也就此從工業生產場景消失。

標舉理性與理性化程序帶來重要影響，因為這取代了傳統生產形式，排除了回想、記憶與時間在生產過程中的關鍵位置。記憶被剔除，最終結果是「服從於即時捕捉的當前時刻」，無法看見除此以外的視角，反映出的是「一種客觀發展律則」（*ibid.*: 339）。於是，工人被客觀化，被剝奪個人性，以及任何他們在其中可看見自己並將其視為已有的反身式歷史，這只有更加速了自主性的喪失，導致工人在政治上永遠無法成熟，只得認同現況，以其為唯一的人生選項。這進一步解釋了，他們為何選擇融入集

體自我，而此集體自我說穿了無異於部落式的國族主義。

《紐約時報》於2020年9月28日揭露了川普向來極度保密的所得稅報稅資料，由此我們再度得知，美國政府如何設計了無比複雜的稅務條規，用盡方法施惠於富豪族群，讓他們可以提報投資損失，無須繳稅。這個驚人的證據，證實了國家機制如何極力確保，多數百姓（除了那些富人才雇得起的稅務律師）對經濟體系運作方式都一無所知，以加深他們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世界上沒有一個威權國家機制像美國這樣，成功地讓公民活在無害的無知當中，讓他們無法理解經濟制度自我行銷為民主的箇中道理，但同時又說服這些一般百姓，他們對制度是莫可奈何的。事實是，美國對於企業的資金補助、鼓勵與保護，程度不下於那些致力打造資源平等條件的社會主義政權，儘管美國總是將自己營造為資本主義與自由競爭、自由貿易價值的先鋒。

由於法西斯主義的時間與記憶概念仰仗的是這些概念在資本主義中並不存在，法西斯於是得以自由地想像一個虛構或幻想的時間性，將其擺放於當前時刻，用以取代被撤離的時間。法西斯主義的最新樣貌與它過往出現過的例證相通之處，是它們都嗜好訴求一種古早的、時序錯亂的當前時刻（這兩者通常指的是相同的事）：不論是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倡揚的「古羅馬精神」（Romanness）、希特勒預告的納粹「千年之國」（thousand-year Reich）、日本的神聖起源論、或是「美國先知的詠嘆」（American jeremiad）（清教徒所打造的關於一個全新、無以倫比的文明的起源神話）。近幾年，我們老是聽到關於美國之例外地位（exceptionalism）的老調重彈：關於它的獨特，以及這背後所暗示的關於歐洲已然窮途末路、我們必須與之切割的說法（Spanos 2007）。然而法西斯主義在當代歷史復現，乃至資本主義衰微，並非巧合：它們所回應的，是歐巴馬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成效不彰的改革，以及自小布希時代便已開始的「經濟崩盤之後一個漫長的回應期」。歐巴馬讓引爆金融危機的主要銀行脫身，從未制裁始作俑者，也未試圖矯正潛在的根由；更糟的是，那些被蒙在鼓裡、失去家園與積蓄的美國人並未得到實質幫助（Riley 2019: xxv-xxvi）。

五

在這些情況下，我們如何理解美國的民主？首先，美國從來不會是我們以為的那個民主共和國。儘管美國的獨立宣言與憲法口口聲聲擁抱所有人民的平等，這些國家經典文獻至多只是期許，它們所宣告的承諾自設立以來一直未能實現，直到今日都被包裝在相同的虛構性中。獨立宣言基本上是一個未經測試的法國啓蒙運動的餘緒，而聯邦憲法（包括修正法案）猶如一張寬大、鬆散的漁網，流失的比捕捉到的還多。所謂的美國民主實驗，一直都只是表象，並無實體；而其成敗結果，在拖遲了幾世紀之後，如今的急迫性更甚以往。

從一開始，問題癥結都在於一個無解的兩難弔詭：民主是致力讓人民充分參與的一種承諾，抑或是滿足個人的一種經營；民主是一種政治與社會生活形式，或是將私人利益置放於社會福利之上。好的民主，其政府形式與社會生活必須能夠同時駕馭集體活動與個人私領域分別的極端發展（Rancière 2005: 14-15）。當年憲法的制定者致力保護私人財產，同時尋求最佳治理形式——對他們而言，這兩者說到底是同一件事。這個堅持，卻使資本主義無法平衡對於私有財產的捍衛以及對於政治、經濟平等的主張。美國發展出自由社會，靠的是在美洲大陸以自由貿易為名肆無忌憚地進行帝國擴張，以此消解私有財產與平等之間的矛盾：兩者之間的曖昧關係，藉由改變其內容之意義而獲得解決；最終，「平等」的意涵變成是對於開放、自由市場的承諾。洛克（John Locke）反對全面福利的理念，巧妙地將全面福利連結於一種無法受控的個人主義，而這自然深化了美國建國之父對寡頭統治的信念，以求避免洛克認為的平民民主（popular democracy）會帶來的無政府狀態。美國早期自認的獨特性尚包括對於共同福祉的肯定，然受到洛克影響後，轉而將稍早的獨特性理解為毫無節制的個人主義，會努力排除任何阻撓利己目的之障礙。此外，洛克效應下的美國原則反轉，亦收編了衝突、不平等以及絕對個人主義所產生的過剩財富，最終將局部性、特定族群原則（particularistic principles）標舉為普遍定理，並落實於一個簡約政府的架構（Williams 2011: 27-74）。

在此寡頭治理結構中，早期的資本主義形式（商人資本制度）必須結合承接自前代的既定政治、經濟操作，最顯著的表現，是歷史學家威廉斯所稱的「封建建制」（feudal constitution），以及配合19世紀新興世界市場所需的生產體系而施行的奴隸制度。此一封建建制——其理念也出現在聯邦憲法——的擘畫者正是麥迪遜，其構想當然是16、17世紀英國殖民者引進美洲的，不只在實際做法上，也在洛克及沙夫茲柏里伯爵（first Earl of Shaftsbury）的理論論述中，麥迪遜對其加以調整，以適應美洲新大陸的環境。簡言之，資本制度挪用手邊可用資源，而這些資源經常承襲自資本主義興起之前的過往，如今用來服務一個不同的、追求剩餘價值的生產模式。

這個架構中隱含（但從未被明說）的，是馬克思所謂的「原始」或「原初」積累的懾人效應，在殘忍的奴隸制度經驗中尤其可見一斑。靠著大量由非洲進口的奴隸，一種古早的剝削式勞力型態被揉合進資本主義為符合世界市場而發展的新型生產模式。麥迪遜規劃出一些方針，用以防止任何派系掌握政府體系，因為這個體系理應展示各州、人民與中央政府之間的平衡。美國聯邦憲法中的封建原則——又被稱為「雙主權聯邦主義」（Dual Federalism）——需要對共同義務做出位階式的組織，並實施威廉斯稱之為組合治理的結構，由社會個別單位所組成，形塑出分層的社會秩序，其目標是在各個單位之間取得平衡，抑制各部分過度之處（*ibid.*: 152）。這個幻想，唯有懷抱貴族階級意識的人才會支持，因為他們深知，他們彼此間一致相信財產權至關重要：「土地使人有充分資格成為自然社會（natural society）的一員。」（*ibid.*: 153）但問題從未獲得解決，今天我們仍然面臨相同的嚴重分化，原被忽略的州級「封建」思維再度復興，而導火線是那從未被憲法背書的相當於寡頭統治的兩黨制度——以目前分化的態勢看來，唯一勉強可能的解決之道恐怕不是找回已然消失的和諧，而是分割或脫離。

川普擔任總統任內，我們在他身上看到的，不僅是悖離現有官僚制度規範，還有全然漠視憲政規劃之分工所體現的平衡與約束。無論這是否造成憲政危機，他的行徑一再證明的是，建國之父用階級意識所擔保

的制衡，至多維持一個世代之久；平衡與約束理念容易使得三權分立機制的協議形式被漠視或違背，結果是所有事情總送往最高法院處理，包括對於總統選舉結果的裁決。這是個從一開始便註定失敗的結構，例子包括了大州與小州都可在參議院獲得同等的代表權、在眾議院獲得相等比例的權力，這其中所透露的妥協。至於協商利益方面，南方各州要求，奴隸只能被視為五分之三的人類，以致生成了選舉人團（Electoral College）這樣的政治怪物，導致總統選舉的關鍵不是單純的普選多數決，而是幾個小州的選民，它們的選舉人集合起來便可推翻普選結果。過時的選舉人團提供了小州不符它們人口比例的權力，就彷彿意味著我們仍須認可奴隸制度——南方或許輸掉了內戰，卻明確贏得了日後的政治角力。美國的代議體系從一開始便是有缺陷、違反民主的，從未被設計成行使總統普選的直接代表制。人民投票選出選舉人，由後者決定下任總統。除了這個選舉設計，參議院的齊頭平等代表制也在體制面確保了，在18世紀末便已設立的寡頭政治將永遠存在。

無論是何種需求才導致如此不民主的妥協，18世紀建國之父們所構思的美國憲政秩序，其核心乃是一種對平民大眾的深刻不信任感。麥迪遜設計的封建結構便是最顯著的例證：對於共同義務、責任施以位階式的安排，意指從一開始被頌讚為民主的政治結構其實從未真正存在，而美國人也都親眼見識了這個體系如何無能為其人民提供全面性福利，雖然它一直高舉人民之名，編織了民主這個虛構故事。

這個歷史功課為何重要？原本被設計來避免發生此刻政治情況的那些被誇耀的制衡方法，乃至不斷被稱呼為「憲政危機」的混亂狀況，輕而易舉地為法西斯主義鋪路，提示我們，我們必須從久遠的過往找回安全感，恢復建國者所承諾的純白種人霸權。如此稍稍檢視美國憲政背後的神話，所揭示的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形似一位日本哲學家在1930年代根據日本情況所定義的「憲政法西斯主義」（constitutional fascism），亦如同將近一世紀後巴迪烏（Alain Badiou）所說的「資本—代議主義」（capital-parliamentarianism）——在我看來，它們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此刻，所有

促成法西斯主義實踐的歷史配備一應俱全，只不過這次明顯是發生在一個不同的時間條件裡：所需要的不再是街頭群眾動員，這次的法西斯實踐是來自總統權限內部。所謂的制衡，不過是一套「紳士們的」協議，而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之間關係界定的鬆散，意謂這當中有著廣闊的空間可供詮釋。

此次法西斯鬼魅現身美國，與它的歷史原型相通之處乃是其危機感。歷史上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在多數國家，當時都在面對世界性經濟衰退帶來的危機，加上中產階級對於勞工之無產階級 / 共產主義革命爆發力的懼怕。無論這樣的危機感與恐懼是想像的抑或真實的，它們的結合，成了削弱自由民主、社會民主機制的好理由，也讓右翼運動在經濟潰決、政治失能之際趁勢壯大。右派分子點名自由主義政體如何無力保護資本主義，伺機利用共產主義的威脅及其意欲打倒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效應。相比之下，我們時代中越來越失敗的各個政治體制，加上許多（甚至多數）高度工業社會中領導層與政治階級的敗壞，展現的是集體的癱瘓，無力應付一個全球性流行病所引發的危機以及後續的經濟停擺——後者的範圍及規模已接近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

此次缺少的，顯然是無產階級革命與共產主義崛起的威脅，雖然仍不乏有人利用「國家即將墮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恐慌言論來策動選民，總讓人聯想到1950年代的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的操作伎倆。在美國，除了有人以虛弱的手法恫嚇選民，自己的國家即將變成另一個委內瑞拉，也有對於國內各城市左翼好戰分子的誇大想像，而這些都只暴露了行政當局如何錯判了一些針對特定事件（非裔美人遭到警察殺害）的合法抗議。我們在這些錯誤判斷中必須注意的是一種白人種族主義的蔓延與強硬力量，其信奉者拒絕區辨那些聲援「黑人活命權」（Black Lives Matter）的合法抗議以及他們失去白人霸權的恐慌；他們將後者解讀為「權利」與「自由」的喪失。而一旦失去的權利與自由被拆解為具體的要求時，我們看見的，是無聊的亂耍脾氣，藉個人主義之名而拒戴口罩——這也成了此刻「容納」與「排除」分類框架的最新定義。川普或許確有他

的墨索里尼時刻——當他用幼稚的自怨自艾與危言聳聽煽動那些參加集會的群眾，鼓動他們對他的敵人生出瘋狂憤怒的情緒。然而，與墨索里尼不同的是，川普傳遞的訊息，多半關乎他的自負以及他讓美國再度偉大的虛構敘事。他的訊息無關人民福利；因為他的冷漠，因為他在不願讓經濟停擺的前提下對於疫情毫無作為，死於新冠病毒的百姓已超過三十五萬人。

這位總統的此類行徑看來或許是美國政治歷史上的異常，但其牽涉的政治其實並無異常之處，甚至有著漫長的系譜。無論哪一個政黨，美國總統的行事，表現出的永遠是在為金權寡頭階級利益而服務，為了歷史賦予少數人之治理特權而服務。這讓我們必須回顧麥迪遜以及18世紀的封建建制概念。值得一提的是，18世紀的美國共和國主義（republicanism）放眼並非普羅民主，而是一種暫時的形式，適用於小規模的領土。隨著西部拓荒，「納入帝國的領地」擴延至超越共同國範圍，此時需要一種治理形式，能夠管理因派系孳生、對個人權利的保護要求也遽增所帶來的衝突。無論個人權利如何曾被觀照，歷史顯示的是，政治領導權的資格賦予不外乎兩大主要途徑：其一，是那些在神賦君權制度下或因為出身、階級而被視為地位超凡的人；其二，是那些擁有財富、可掌握生產活動與社會再生產資源的人。偶爾，這兩大管道會容納知識分子以及身負技術與專才的科學專家（Rancière 2005: 53）。

美國這樣的社會，治理者通常來自這兩大類的綜合體，尤其是第二大類；第一類的優勢只維持到英國殖民統治結束。也因此，我們很難將美國建國視為一種民主，因為「民主既非一種憲法型態，亦非一種社會形式。」（ibid.: 54）這或許是為什麼一個地方性的稅務抗爭會被稱作革命。號稱為人民力量者，從來不是一個占據人口多數或組成勞務階級的普羅合眾（re-united population）；「人民」，不過是那些沒有資格治理、只能被治理之人的新定義。統治階層會試圖防止這些無資格者干預政治，例如架空人民被賦予的主權。憲法制定者一致同意的是，人民不該實際涉入政治領域，影響治理的運作。

這個寡頭治理根基，造成有資格統治者與理應被代表的百姓之間距離

日漸拉大，也解釋了何以近幾十年政府愈來愈無法照顧人民福利，終究演變為此刻我們社會的災難性景況。在這裡談民主治理是毫無邏輯的，因為這裡只看到特權少數統治多數的離譜情形。這個以民主之名行寡頭治理之實的傳統，可以說明為何美國二戰之後的外交政策花了相當力氣扶植世界各地的威權政體，卻稱呼它們為民主。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認為，所謂的「人民的權力」就如患了肥大症一般（hypertrophic），只在不正常時空裡發生，在一個不平等社會裡毫無作用（ibid.: 59）。

同理，我們也認識到，代議（representation）從來不是一種彌補人口數量龐大的制度，而是緊緊依存於一個代表少數人的寡頭建制。在美國，代議制大概更熱衷服務那些代理私人企業的政治遊說人士；這些企業會提供報償，答謝議員們的支持。此一支持與酬庸循環所造就的政治再生產方法，讓那些握有權力的菁英階級得以延續他們在政府結構中的位置，幾乎是永久占著這些閒差。美國建國之父——以及部分仿效他們的法國政治人——將代議視為菁英階層為人民行使權力的工具，這項人民權力是他們有義務確立的，但他們卻不知如何在過程中不會危害政府治理的原則（ibid.: 60）。這即是洪席耶頗為明智點出的「對民主的憎恨」（hatred of democracy）。歸結而言，連投票都已變成一場例行程序，無啥實質意義，兩大黨將時間、財力消耗在壓制選民（voter suppression）一事上，想辦法抑制過多的投票人數，卻不花心思在真正投下有效票的人身上。在我撰寫這篇文章的當下，一些南方州曾長期用來遏止非裔美人投票的卑劣手段以新式面貌又再度出籠。

在此簡要討論美國民主的缺席，重點並非呈現一個過去不為人知的美國政治歷史，彷彿那是天大的秘密。這個殘酷真相向來是公開的，顯而易見，就如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筆下的〈失竊的信件〉（“The Purloined Letter”）：明明近在眼前，卻被視若無睹或是刻意忽略。這裡的目的是要揭示，填實美國政治空間的歷史裝備，如何在體制面發展出特定的設計，使得它永遠有機會演變為極度威權的政治形式，例如法西斯。在國家創建之初，以現成的半封建結構以及保留給特定合格者的菁英式領導

制度作為政治起源之基礎，是永遠不可能隨著時間而更加民主的，它只會轉為更威權，除非出現一場真正的社會革命加以干擾。

只要稍加檢視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新政（New Deal），便可窺見這個趨向威權主義的發展可能性：那是個溫和的、非革命性質的反資本主義心態，是對於經濟大蕭條以及西部乾旱問題的回應，促使羅斯福在改革措施中施行了緊縮管制，但尚未過當，因為二戰的開打成為優先要務，急迫性勝過國內的經濟復甦與政治的重整。

然而，在眼下這個時代，我們早已步入法西斯威權主義的道路。必須留意的是，此刻重現的法西斯並非如1930年代法西斯運動那樣肇因於任何革命的威脅。當代美國的法西斯，成因為2007-2008年金融風暴後經濟的難以復原。讓情況更加嚴峻的是，政府將大量原本用以約束企業的限制以及保護環境的規定一概撤消，理由是要嘉惠國家與百姓，其效應卻是讓不平等情況急遽惡化，並創造了一批新富階級。以萊利（Dylan Riley 2019: xxvi）的說法，「曾經標誌法西斯運動的反革命活力，如今是不可能被複製的。」

如前所述，要描述目前的情況，直接援引歷史上的法西斯案例，是不妥當的；這樣做只會輕忽當時情況與現在情況各自的獨異性。我們活在不同的政治氛圍與歷史條件中，政治壓迫形式是會有差異的。我們確實不需要擔心會有突擊隊在黎明時分闖入家門，把我們抓走，但我們卻需要警覺，那些自命為準軍事部隊（paramilitary）的團體宣示他們會捍衛自身權利不受侵害：他們眼中的權利，本質上卻會阻撓他人行使權利，尤其假使背後動機為白人優越主義與種族仇恨。這些團體的所作所為，沒有絲毫民主之處。他們被稱呼為「平民主義者」（populists），我認為是個錯誤，因為他們其實不過是一群又一群到處兜轉、各自為政的自大狂所集結的烏合之眾，一心只想讓社會融合（inclusion）難上加難；他們的「計畫」非但不民主，那還是個假的平民主義，用來遮掩他們將排斥異己（exclusion）之權利視作個人自由的防禦心理。長期而言，更令人憂心的是最高法院的機制：最高法院目前由一股政治性反動的偏頗風氣所主導，加上負責事務範

圍逐步擴張，幾乎可以介入每日生活的大小環節，讓人不禁聯想起當年德國的法院如何選擇為納粹命令服務。聯邦憲法讓最高法院成員可以免於對百姓直接負責，賦予他們終身職的特權，這意謂21世紀的生活與社會裡竟有著鮮明的18世紀遺緒，更驚人的是，現任成員中有人還以「原始主義」（originalism）意識型態為名擁抱舊時代的傳統。

我提出的論點是，我們總喜歡宣傳那些帶有程序性的形式——例如選舉、代議制、18世紀憲法所設計的體制內之制衡方法，乃至於美國歷史學家喜歡禮貌性稱呼為「革命」的事件——然而這些形式的內容早已被掏空剔盡。我們看到的是，直到冷戰結束前都仍是私有領域（即公民社會）保護者的國家機制已從它傳統上的公眾空間任務撤守：過去，它或多或少有盡責扮演角色的義務，但如今已無必要傾聽人民；國家機制已經學會，說謊和說實話都是可以的。於是，國家機制此刻占據了已被挖空的私領域。在新自由主義躍升為霸權、自由主義失敗瓦解之際，真正的權力已從國家機制移轉至金融與政治階級，這些階級因為國家政策而受惠、致富，他們如今只將國家視為壓制任何抗爭跡象（無論是衝突、失序或恐怖主義）的工具。換言之，國家機制如今成了資本主義的委任者（placeholder），甚至是地位特殊的工具，使富者更富，使百姓中的不平等現象益加嚴重。在此同時，國家機制也和它曾經誓言保護的人民成了敵對者，極力削弱民主個人主義所珍視（而法西斯主義懼怕）的主體自主性，將公共領域變為單純發表論述（即無止盡的瑣碎言談）的場域，什麼事也成就不了。

為何稱之為「法西斯主義」？我們不能用「極權主義」：因為這個詞前不久的例子是蘇聯共產主義，它是反資本主義的；而今日的例子則是中國，它既是個國家機制主導的資本主義，又是共產主義政體。「威權主義」也不甚妥當：它讓人聯想到各種形式的軟性獨裁（petty dictatorship），有些是我們支持過的，有些是我們曾嘗試扳倒的。至於「帝王總統制」一詞也不適切：它讓行政首長形象猶如當年「美國革命」企圖驅除並以「總統」這個發明取而代之的一國之王。

用「法西斯主義」概念，至少可在過往歷史形式與今天的情況之間找

到些許相似性，其共通性包括了不計一切代價地為資本主義從自己製造的難題中解套。在此瘟疫蔓延之際，美國政治的現狀是，它在各個方面都證明自己是個嚴重失效的系統，無力服務人民，而百姓必須長期靠著有限資源自力救濟，同時深知，即便復返不存在的過去，也不會帶來任何前景。至於廣為流傳的渴望回到（眾人勉強記得的）「正常」的說法——這些人必須小心他們許下的願望，因為他們寄望的正常，正是那個把法西斯鬼魅帶到我們時代的那個制度。選擇回到瘟疫剛發生前的那個政治與經濟亂象，是毫無道理的。更好的選項是，我們開始將自己和過去那些讓人失去行動力的幻想切割，無論這是如何艱鉅的工作。美國現有制度為它的人民帶來的是深層的政治經濟不平等與巨大的破壞，我們應該開始思考，如何將自己從這個殘壞、腐敗的治理制度解救出來——假使美國人民確曾被賦予「以民為主」治理責任的話。

引用書目

- Adorno, Theodor W, translated by Henry W. Pickford. 1998. "The Meaning of Working through the Past," in *Critical Models: Interventions and Catchwords*, pp. 89-10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 2000. "Freudian Theory and the Pattern of Fascist Propaganda," in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edited by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phardt, pp. 118-137. New York: Continuum.
- , translated by Nicholas Walker. 2017. *An Introduction to Dialectics*. Edited by Christoph Ziermann. Cambridge, UK: Polity.
- Adorno, Theodor W et al. 1950.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 Chow, Rey. 1998. "The Fascist Longings in Our Midst," in *Ethics after Idealism: Theory-Culture-Ethnicity-Reading*, pp. 14-32.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translated by Brian Massumi. 1987.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lle plateaux: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Levi, Primo, translated by Raymond Rosenthal. 1989. *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 (I*

sommersi e i salvati). New York: Vintage.

——, translated by Nathalie Bauer. 2004. *L'asymétrie et la vie: Articles et essais, 1955-1987*. Paris: Robert Laffont.

Nancy, Jean-Luc, translated by Cynthia Chase et al. 1990. "Our History," *Diacritics* 20(3): 96-115.

Poulantzas, Nicos. 1979. *Fascism and Dictatorship: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nd the Problem of Fascism*. London: Verso.

Rancière, Jacques. 2005. *La haine de la démocratie*. Paris: La Fabrique.

Riley, Dylan. 2019. *The Civil Foundations of Fascism in Europe*. London: Verso.

Spanos, William V. 2007.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the Jeremiad, and the Frontier: From the Puritans to the Neo-Con-Men," *boundary 2* 34(1): 35-66.

Toscano, Alberto. 2017/04/02. "Notes on Late Fasc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log. Retrieved from: <https://www.historicalmaterialism.org/blog/notes-late-fascism> on Nov. 10, 2020.

Williams, William Appleman. 2011. *The Contours of American History*. London: Verso.